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

第一輯

內部資料 負責保存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

1956年7月15日

編 者 說 明

一、为了有助於对南斯拉夫問題的研究，特把現在能够收集到的有关南斯拉夫問題的材料，擇其較重要者，彙編成这部“南斯拉夫問題資料”集。

二、本資料集所收集的材料，除了一小部分材料以外，主要是南斯拉夫領導者的著作、文章、报告等等。大致按照材料的性質，分編成六輯。第一輯是關於苏南关系；第二輯是關於南斯拉夫的國家和社会制度等問題；第三輯是關於在南斯拉夫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問題；第四輯所包括的是有关与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的材料；第五輯是工会問題；第六輯則包括一些其他材料。

三、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材料是从塞爾維亞文翻譯过来的，一小部分是从俄文轉譯的，所以有些譯名很不統一。又由於有的譯者对南斯拉夫問題沒有專門研究，而且对塞爾維亞文造詣較差，故某些譯文不很通順，有的地方甚至生澁難懂。

G-6
000085

V₁

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一輯）

目 錄

- 1、關於南斯拉夫問題，南共中央和聯共中央的往來
信件……………（ 1 ）
- 2、南共中央致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聲明
（1948年6月20日）……………（ 54 ）
- 3、南共中央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對南共情況的決議的聲
明（1948年6月29日）……………（ 57 ）
- 4、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
的決議……………（ 66 ）
- 5、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兇手和間諜掌握中（1949年11月
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 75 ）
- 6、格·喬治烏—德治在1949年11月共產黨情報局會議
上的報告……………（ 81 ）
- 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
決議（1948年7月10日）……………（ 100 ）
- 8、1954年十月革命節薩布羅夫同志報告中有关南斯拉夫
的一節……………（ 102 ）
- 9、1955年2月莫洛托夫同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
報告中有关南斯拉夫的一節……………（ 103 ）
- 10、1955年3月蘇聯真理報評鐵托總統的演說……………（ 104 ）

11、鉄托在南議會關於外交政策的報告	
(1955年3月)	(108)
12、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貝尔格莱德，赫魯曉夫團長在	
机場上發表談話	(119)
13、苏南兩國政府宣言(1955年6月2日)	(124)
14、鉄托在卡罗發茲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1955年8月)	(129)
15、鉄托總統致函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136)
16、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26日“战斗报”	
社論)	(138)
17、卡德尔向英國廣播公司評論員談苏南关系等	
問題	(141)
18、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國總統鉄托向塔斯社記者的	
声明	(145)
19、伏罗希洛夫和鉄托在莫斯科“基輔”車站上的相互	
致詞(1956年6月2日)	(147)
20、伏罗希洛夫和鉄托在6月4日的宴会上	
的講話	(151)
21、布尔加寧和鉄托在6月5日招待会上的講話	(155)
22、伏罗希洛夫和鉄托在6月6日招待会上的	
講話	(161)
23、赫魯曉夫在苏南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講話	
(1956年6月19日)	(165)
24、鉄托在苏南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講話	
(1956年6月19日)	(175)

25、苏联和南斯拉夫兩國政府的联合声明	
(1956年6月20日)	(183)
26、关于苏南兩國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1956年6月20日)	(190)

關於南斯拉夫問題，南共中央和 聯共中央的來往信件

序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原序。節譯。）

由蘇、波、捷、匈、羅、保、南、法、意九國共產黨組成的共產黨情報局於1947年9月成立，總部設在貝爾格萊德。

共產黨情報局開除南共的公報，於1948年6月28日首次公佈在捷共機關報“紅色權利報”上。同時，情報局總部遷到布加勒斯特。上述公報載於1948年7月1日出版的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上。

6月29日，南共黨發表了它對情報局公報的答复以及6月20日它致情報局的聲明。

8月下旬，在貝爾格萊德出現了一本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的小冊子，是聯共機關報“真理報”社出版的，其中包括1948年3月27日、5月4日和5月22日聯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三封信。這裡收錄的該三封信就是從該小冊子譯出的。

不久，出現了另一本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的小冊子，其中除上述三信外，還包括1948年3月20日、4月13日和5月17日南共中央致聯共中央的三封信，共產黨情報局公報，南共中央的答复，以及一篇說明南共立場的長篇序言。這裡收錄的南共中央的三封信和答复就是從該小冊子譯出的。

聯共3月27日和5月22日信中所提到的南共3月18日和5月20日的信，至今未予公佈。

附註是我們為幫助讀者而加上的，（中譯時說明為“英註。”）

南共中央致联共中央

約·布·鉄托致維·米·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3月20日)

3月18日巴斯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他從蘇聯人民國防部長布爾加寧元帥那里收到一封電報，通知我們，蘇聯政府已決定立刻撤退所有的軍事顧問和教官，因為他們“被敵意所包圍”，就是說，他們在南斯拉夫沒有受到友好的待遇。

自然，蘇聯政府如果願意，隨時可以召回它的軍事專家，但是，蘇聯政府為其決定所舉出的理由使我們迷惑不解。根據這一指責，我們調查了我國低級領導人員對蘇聯軍事顧問和教官的關係，我們深信，他們撤退的這一理由是沒有根據的，在他們留在南斯拉夫的整個期間，對他們的關係不僅是好的，而且實際是兄弟般的和最好客的，這是新南斯拉夫人民對待一切蘇聯人民的習慣。因此，我們迷惑，我們不能理解，而且由於未被告知蘇聯政府作此決定的真正理由，我們的感情深受傷害。

其次，1948年3月19日阿爾馬尼諾夫代辦來訪並通知我一封電報的內容，其中蘇聯政府下令也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的文職專家。我們不能理解作此決定的理由，並感到迷惑。的確，基得利奇部長（南斯拉夫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英註）的助理塞然迪茲曾向你們的商務代表列別節夫說：按照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項決定，他無權把重要的經濟材料給予任何人，蘇聯人要得到這種材料，應向上級，即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提出。同時塞然迪茲告訴列別節夫，要他向基得利奇部長

提出索取使他有興趣的材料。你們的人早就被告知過，蘇聯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從我國領導者那里直接獲得一切重要的和必要的材料。

我們方面之所以發佈這個決定，是因為我們各部的所有的公務人員曾經把材料給予任何人，不論有無這個必要。這意味着他們會把國家經濟機密給不同的人們，這種機密可能，而且在某些場合已經落入我們的共同敵人的手中。

關於我們的人有權不經政府或中央委員會的同意而把經濟材料給予蘇聯經濟工作人員，除了在他們的職務範圍內對他們是必要的材料以外一節，我們並沒有專門的協議，像電報中所說的那樣。無論何時蘇聯大使拉夫連傑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材料時，我總是無保留地給他，我們的其他負責領導者也是這樣做的。從國家的觀點出發，我們的這種態度如果得不到蘇聯政府的同意，那是會使我們感到很驚奇的。

同時，關於這件事，我們不得不拒絕關於所謂對待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專家和蘇聯代表有些“缺少款待和缺少信任”的這個理由。到現在為止，他們之中沒有一人曾向我們抱怨任何像這樣的事，雖然他們全都有機會親自向我這樣做，因為我從未拒絕接見任何蘇聯人。這一點對我們所有負責的領導者來說，也都如此。

從這一切可以看出，上述這些理由不是蘇聯政府採取這些措施的緣由，而我們希望蘇聯方面公開告訴我們毛病何在，希望它指出每一件它感到對我們兩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不符合的事情。我們覺得這種發展對兩國都是有害的，或早或遲，干預我們兩國間的友好關係的一切事物都必須加以消除。

鑒於蘇聯政府正從其他的一些人獲得情報，我們覺得它在使

用这种情报时应该小心，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总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于好意而提供的。

再一次，接受我的敬意。

部長會議主席 約·布·鉄托

1948年3月20日

联共中央致鉄托同志和南共其他中央委員的信

(1948年3月27日)

你們3月18日和20日的答复收到了。

我們認為你們的答复是不正确的，因此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 賈格里納夫（苏联駐南斯拉夫貿易代表团團員——英註）的問題可以被認為結束了，既然你們已撤回对他的指責，虽然我們仍認為那些指責是誣蔑性的。

据指称为克魯傑科夫同志（苏联对外貿易部副部長——英註）所說的話，即所謂苏联政府今年已拒絕進行貿易談判，可以看出，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克魯傑科夫已断然否認說过这样的话。

(二) 關於撤退軍事顧問一点，我們的材料來源是武裝部隊部的代表們和顧問們自己的話。如你們所知，我們的軍事顧問是經南斯拉夫政府屢次請求而派到南斯拉夫去的，而且派去的顧問远少於所請求的数目。因此，顯然苏联政府無意於強使南斯拉夫接受它的顧問。

然而后来，南斯拉夫的軍事領導者，其中包括科查·波波維

奇，竟認為有可能宣佈稱：有必要把顧問的數目減少60%。他們為此舉出了各種理由；有人說蘇聯顧問對南斯拉夫是過大的經濟負擔；有人說南斯拉夫軍隊不需要蘇聯軍隊的經驗；有人說蘇聯軍隊的規則是保守的、老一套的，對南斯拉夫軍隊沒有價值，而既然從蘇聯顧問那里得不到什麼好處，付給他們錢是無謂的。

鑒於這些事實，我們就可以懂得德熱拉斯（南斯拉夫共產黨鼓動宣傳部部長——英註）在南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蘇聯軍隊的有名而侮辱性的發言，即所謂從道德觀點看，蘇聯軍官是次於英國的軍官的。如所共知，德熱拉斯這一反蘇的發言並未遇到南共其他中央委員的反對。

這樣，南斯拉夫軍事領導者們沒有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問題上同蘇聯政府覓取友好的協議，而卻開始誹謗蘇聯軍事顧問和詆毀蘇聯軍隊。

很明白，這種情況必然會在蘇聯軍事顧問們周圍造成敵意的气氛。如果認為蘇聯政府會同意把它的顧問們在這種情況下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既然南斯拉夫政府沒有採取措施去抵消這種詆毀蘇聯軍隊的企圖，它對所造成的情況應該負責。

（三）導致我們撤退蘇聯文職專家的材料來源，主要是蘇聯駐貝爾格萊德大使拉夫連傑夫以及專家們自己的話。你們所說的，所謂塞然迪茲曾告訴貿易代表列別節夫，需要經濟材料的蘇聯專家應向上級，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請求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是拉夫連傑夫3月9日作的報告：

“基德利奇在經濟委員會中的助理塞然迪茲，把一項政府命令通知了貿易代表列別節夫，該命令禁止國家機關把任何經濟材料給予任何人。因此，不管早先的諾言，他不能供給列別節夫以

所需的細節材料。國家保安機關的任務之一是在這件事上施行控制。塞然迪茲還說，基德利奇自己打算和列別節夫談一談這件事。”

从拉夫連傑夫的報告可以看出，第一，塞然迪茲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到關於从南共中央或南斯拉夫政府獲得經濟材料的可能性。不論怎樣，在有关各部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苏联專家過去是直接从各部得到必要的經濟材料的），为了獲得一切經濟材料將有必要向南共中央提出，這是可笑的想法。

其次，从拉夫連傑夫的報告可以看出，和你們所寫的相反的才是事實，即南斯拉夫保安機關控制和監督着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代表們。

值得提出，我們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碰到過類似的对苏联的代表們進行秘密監督的作法，雖然不是在所有的資產階級國家中都這樣。同時應該強調，南斯拉夫保安機關人員不僅对苏联政府代表的消，而且也對联共黨駐共產黨情報局代表尤金同志的消。在這種情況之下，以為苏联政府會同意把它的文職專家們留在南斯拉夫，是可笑的想法。在這件事中同樣可以看出，造成目前情況的責任在於南斯拉夫政府。

（四）在來信中，你們表示希望被告知其他有什麼事實導致了苏联的不滿和南苏之間的关系的緊張。這樣的事實是存在的，雖然它們同樣撤退文職和軍事顧問無關。我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事實告訴你們。

（甲）我們知道，在南斯拉夫領導同志中間流傳着反蘇的謠言，例如說“苏联共產黨是墮落的”，“在苏联大國沙文主義很猖獗”，“苏联企圖在經濟上支配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報局

是苏联共产党用以控制其他共产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断語通常是用左的詞句伪装起來的，例如說“在苏联社会主义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只有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自然，从德热拉斯、伏克曼諾維奇（前國防部助理部長，1948年8月被任命为礦山部部长——英註）、基得利奇、蘭科維奇（內务部長，1948年8月成为副总理——英註）和其他这种可疑的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类關於苏联共产党的話，是可笑的。然而，事实上这种謠言在許多南斯拉夫高級官員中間長期流傳过，而且还在流傳着，而这种謠言自然造成着一种反苏气氛，这种气氛危害着联共和南共之間的关系。

我們当然承認，每一个共产党，包括南共，有权批評联共，正像联共有权批評任何其他共产党一样。但是馬克思主义要求批評是光明正大的而不是背地的和誹謗的，以致使被批評者沒有机会对批評提出答复。然而，南斯拉夫官員們的批評既不是公开的也不是誠实的；它是背地的、不誠实的和虛伪的，因为在背后詆毀联共的同时，他們公开地却法利賽人似地把联共誇上天去。这样，批評变成了誹謗，变成了詆毀联共和污辱苏維埃制度的企圖。

我們並不怀疑，南共黨員群众如果知道存在着这种反苏批評，他們是会宣佈它是異己的和敌性的而加以排斥。我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南斯拉夫官員們秘密地、在群众背后作这些批評的緣故。

再者，可以提到，当托洛茨基决定对联共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責联共为墮落，为受到大國狹隘民族主义的限制而开始的。自然，他用關於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來伪装这一切。然而，大家知

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自己成为墮落的，当他被揭露后，他就叛变而加入了联共和苏联的死敌的营壘。我們認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乙）對於南共党的現狀，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对下列事实迷惑不解，即作为領導的党的南共党还不是完全合法的，还保留着半合法的地位。党的机关的決議从不在報紙上發表，党的會議的报告也是如此。

在南共党本身内部，民主是看不到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員都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党内不存在，或者是几乎不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党的人事部部长同时是政府的國家保安部部长。換言之，党的幹部是在國家保安部的監督之下，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党應該控制全國所有的國家机关，包括國家保安部在內，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國家保安部控制了党。也許这一事实可以說明为什么在南斯拉夫黨員群众的主动性够不上需要的水平。

我們不能認為这样一种共產党的組織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式的，是布尔什維克式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南共中，感不到階級斗争政策的精神。農村和城市資本主义成分的增長進行得很快，而党的領導並沒有採取措施去制止这种資本主义成分。南共正被从伯恩斯坦、伏尔馬和布哈林那里抄襲來的關於社会主义制度和和平吸收資本主义成分的墮落的和机会主义的理論所蒙蔽着。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党被認為是全國的領導力量，有它自己特殊的綱領，而且不能和非党群众融为一体。在南斯拉夫，相反地，人民陣綫被認為是主要領導力量，並且有人企圖把

党溶解在人民陣綫之中。铁托同志在人民陣綫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演講說：“在人民陣綫的綱領之外，南斯拉夫共產党有沒有任何其他の綱領呢？沒有，南斯拉夫共產党沒有其他的綱領。人民陣綫的綱領就是它的綱領。”

这样，看起來，在南斯拉夫这种奇怪的党的組織原理被認為是一个新的原理。实际上，它远不是新的。在俄國40年前，一部分孟什維克分子曾建議把馬克思主义政党溶解在一个非党的工人群众組織之中，由后者取代前者；另一部分孟什維克分子則建議把馬克思主义政党溶解在一个非党的工人和農民的群众組織之中，也由后者取代前者。如所周知，列寧称这些孟什維克分子为惡毒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丙）我們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國間諜佛利比特仍然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里任第一助理部長。南斯拉夫同志們知道佛利比特是一个英國間諜。他們也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們認為佛利比特是間諜。尽管如此，佛利比特仍然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助理部長的职位上。有可能南斯拉夫政府恰恰是打算把佛利比特当作一个英國間諜來使用。如所周知，有些資產階級政府認為可以容許帝國主义大國の間諜充当它們的政府官員，以便保證它們的善意，甚至於可以为此目的而把它們的人置於这些帝國主义大國の監护下。我們認為这种作法对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不能容許的。不論如何，苏联政府不能把它同南斯拉夫政府的往來函件置於一个英國間諜的檢查下。可以理解，只要一天佛利比特还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里，苏联政府認為它自己被置於一个困难的境地並被剝夺了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同南斯拉夫政府進行公开通信的可能性。

就是这些事实造成了苏联政府和联共中央的不满，並危害着苏南之間的关系。

如前所述，这些事实同撤退軍事和文职專家的問題是無关的。然而，在我們兩國間的关系的惡化中，这些事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3月27日莫斯科

**南共中央致联共中央約·布·鉄托和爱·卡德尔
致約·維·斯大林和維·米·莫洛托夫信**

(1948年4月13日)

在答复你們1948年3月27日的來信时，我們首先必須強調指出，我們对該信的語調和內容感到異常驚訝。我們覺得，該信之所以有这样的內容——即有这样的譴責和对个别問題的态度——是因为对这里的情况沒有足够的了解。對於你們的結論，我們只能这样解釋：苏联政府是从它的代表們那里獲得不准确的和有偏向的情报，那些代表們由於对情况缺乏了解，一定是从各种人——或者是知名的反党分子，或者是对党不滿的人——那里獲得这样的情报。在南斯拉夫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上，事情弄得很明白而且証实了：斯·米納維奇和阿·赫布朗（此兩人原为南共中央委員，在政府中有高的职位，1948年4月被南共开除出党，其后並被逮捕——英註）乃是主要的罪人，他們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們提供了關於据称是某些領導人的言論以及關於我們整个党的不正确的和誹謗性的情报。他們希望利用这些不准确的、

誹謗性的情報來掩蓋他們的反黨活動以及他們早先就暴露了的想破壞領導和整個黨的團結的傾向和企圖。此外，從這種人得到的情報不可能是客觀的，或者是充滿好意的，或者是準確的；這種情報通常帶着特定的目的。在這件具体的事上，那樣的情報是旨在為我們黨的領導——亦即為新南斯拉夫造成困難；使已經是困難的發展我國的任務更加困難；使五年計劃不可能實現，從而使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成為不可能。我們不能明白，為什麼直到今天，蘇聯的代表們沒有堅持同我國的負責人一起來証實這種情報的真偽，就是說，沒有從南共中央或政府那里查對這種情報。我們認為，發出這樣的情報是反黨和反國家的行為，因為它弄糟了我們兩國間的關係。

不管我們每一個人是多麼熱愛社會主義的國土——蘇聯，他對自己的也正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愛，是不會少一些的——在這個具體情況下，就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為了這個國家，它的數以千計的最進步的人民犧牲了生命。我們很知道，在蘇聯，人們同樣地了解這一點。

尤其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是，當卡德爾（南斯拉夫副總理，1948年8月被任命為外長——英註）、德熱拉斯和巴卡里茲（克羅地亞總理——英註）作為我們黨和政府的代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這些事一點都沒有提到。從你們的來信可以看出，在我們的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之前，你們已經得到了上述情報以及類似的情報。在我們看來，關於對軍事和文職專家的關係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那時就可以向我們的代表團提出。

我們認為，關於蘇聯政府不滿於我們的人對待蘇聯專家的行為一事，當時就通過該代表團，或者甚至更早就通知我國政府，

而且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把事情搞清楚，乃是必要的。而發生的事却是：苏联政府沒有發出正式通知就決定撤用軍事專家，使我們面臨一个既成事實，这样就為我們製造了不必要的困難。

至於撤回苏联軍事專家的問題，除了我們由於財政上的困難決定把他們的人數減到必要的最少數之外，我們看不出还有什么旁的理由。1946年聯邦政府總理鐵托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連傑夫同志說，由於很多原因，我們几乎不可能付給苏联軍事專家如此高的薪金，並要他把这个情况以及我們希望苏联政府削減在專家待遇方面的条件的願望通知苏联。拉夫連傑夫大使得到苏联的回答說，薪金不能減低，我們可以按我們願意的去做。鐵托立刻通知拉夫連傑夫說，既然这样，我們將不得不減少專家的人數，当一旦有可能这样做而不致對我們的建軍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難的話。苏联專家的薪金是四倍於我們軍隊司令官的薪金，三倍於我們聯邦部長的薪金。那時我們軍隊中的司令官，一名中將或上將，每月拿9千到1万1千狄那尔，而一个中校，上校和將軍級的苏联專家每月拿3万到4万狄那尔。同时，我們的聯邦部長每月的薪金則是1万2千狄那尔。可以理解，我們覺得這不僅是个財政負擔問題，而且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我們的人中間引起誤會。因此，我們是為了上述理由，而不是為了其他理由而決定減少苏联軍事專家的人數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並不排除我們的某些人作了不適當的評語的可能性。如果發生这样的事，有必要向我們提出有关的、加以適當証實的情報，而毫無疑義，我們將不讓这种情况再度發生。这里我們必須提一下，有些苏联專家的行為並不总是像它应当的那樣，这就引起不滿，其結果是各種評論便違反我們的意願而產生了，这些評論後來被歪曲了，而這